

女電影攝影師說秘魯人口販賣陷阱

在電影業眾多崗位中，電影攝影師可說最少女性擔任，過去器材沉重，女性總被歧視為應付不來這體力要求高的工作，隨着科技進步，攝影機日趨輕便，愈來愈多女性投身，然而，想得到由男性主導的電影圈認同，又要兼顧家庭責任，並不容易。

入行20年的比利時電影攝影師Virginie Surdej自言是幸運的人，一路沒遇過太多困難，成績更獲獎項認同。她父母都是太空人，一輩子探索地球外的世界，不過，她對地球上的人興趣更大，電影正提供機會讓她了解每個人的獨特性。「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，都讓我可以在他人的心中度過一段美麗旅程。」

此次Virginie受訪，因她掌鏡的《以無名之名》(By the Name of Tania) 在香港放映。電影屬於 **香港藝術中心**「持攝影機的女人：女性電影攝影師作品」節目一部分(《以無名之名》已放映，其他節目至9月23日)。故事講述一個秘魯印第安少女如何逐步跌入人口販子的陷阱，成為被迫在金礦賣淫的性奴隸。兩位女導演Mary Jimenez和Bénédicte Liénard訪問多個受害少女，根據她們的證詞塑造出Tania一角，拍成半虛構紀錄片。

這電影源自她們上一套紀錄片Sobre las brasas，當中一個受訪年輕人15歲時被囚禁於金礦探礦，日復一日地勞動，唯一安慰是去妓院光顧他一見鍾情的女人，一天他腦內冒出想法：如果今天不離開，我就會死在這裏，於是決定逃跑。臨走前他到妓院找意中人一起私奔，她拒絕了，因為還有債未還清不能離開。

長期受到非人對待

這個故事深深觸動兩人，為何明明有機會逃跑也會拒絕？兩位導演深入金礦區，採訪多個從事性工作的女孩，發現多屬人口販賣受害者，隨後Virginie結識當地一位致力營救這些女孩的警察，從他手上得到大量證詞。由這些真實經歷，她們綜合出被騙女孩的遭遇，通過Tania講述這些少女的心路歷程。

落入圈套的少女多是親人已逝、無依無靠，或者家境窮困、難以維生，突然有個非常友善的陌生女人出現，借錢給她們解決難題，並說可介紹她們到金礦區做侍應，只要工作一陣子就能過上好生活。她們不虞有詐，毅然離鄉別井，中途人口販子露出真面目，將她們的身份證摧毀，然後用各種手段逼她們接客，不從就用暴力迫害、毀其容貌甚至殺害。

妓院設定嚴苛規矩，只要觸犯瑣碎規條就要罰款，因此就算每日出賣身體，她們也得不到收入，反而債務不斷累積，染性病都不獲治療，懷孕被迫打胎後，第二天又要如常工作。長期的非人對待讓這些少女失去反抗能力，即使有機會被救，她們也因為無法面對不堪過去而拒絕。

電影議題沉重，而且沒劇本，只有人物的證詞作畫外音獨白，畫面如何配合，Virginie和導演摸索很久。「Tania是一切受迫害女孩的化身，她的旁白都是真實證詞，要用哪些畫面來配合呈現，我們有不少討論。希望觀眾能走進這女孩的記憶，與她一起經歷過去。」

最後她們找到一種獨特的視覺語言，沒拍攝充滿戲劇張力的虐打、強姦畫面，涉及女孩難以面對的回憶時，更會將畫面模糊處理，集中呈現女孩在暴力事件後如何努力存活。「我們沒表現太多情節，反而集中在細節，力求在不表現暴力的情況下談論暴力，讓人更深入地了解它的機制，以及所造成創傷。」

電影中有大量穿越亞馬遜流域的畫面，交代主角如何懷着希望穿州過省，最後卻被困在其中，風景重複和無限延伸，予人無處可逃之感。「她們被未知的恐怖未來困住了」。

為着真實呈現妓院的惡劣狹小環境，她們在非常小的空間內拍攝，鏡頭與扮演Tania的演員Lydia相當近。Lydia並非專業演員，而是住在當地性暴力受害者庇護所的少女。她曾經被繼父強姦，臉上陰鬱的表情透露痛苦的過去，但身上卻有某種不屈不撓的莊嚴。兩位導演曾在庇護所舉辦攝影研討會和工作坊，見到Lydia後認為是合適人選。

「兩個導演和她認識已久，從小相機開始，讓她習慣鏡頭的存在，因此到達現場後，她很快投入。」
Virginie說Lydia的倔強眼神，正賦予人物實感。

拍攝這些創傷故事後，她久久無法釋懷，但更肯定自己做的事正確。「電影讓這些證詞得以保存、散播、被聽見，打開觀眾眼睛的同時，讓這些被嚴重剝削和忽視的女孩找回靈魂。希望人們意識到這些暴行的存在，嘗試做些什麼。」

波蘭電影大師粉絲

Virginie入行20年，她在波蘭出生，是波蘭和比利時混血兒，父母都是太空人，每三四年換一次駐守基地。大約10歲時，有紀錄片拍攝團隊到家中拍父親的日常生活，她眼界大開，發現用移動鏡頭來說故事更有趣，從此沉迷，其後成為波蘭電影大師奇斯洛夫斯基粉絲，並決定投身電影工業。她認真地說：「我對於人以及他們如何互動十分感興趣，想更深入地了解他們，電影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空間。」

Virginie先入讀比利時的INSAS電影學院，再前往波蘭知名的Léon Schiller Institute進修，波蘭斯基、華意達、蒙克等都是著名校友。畢業後，她成為電影攝影師，從短片和紀錄片開始，打滾多年，慢慢有大型製作邀約，掌鏡的作品曾獲國際獎項，例如Adam在兩舞電影節及迦太基國際電影節獲最佳攝影獎項，Our Mothers獲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。

在她修讀電影的年代，女學生不少，「大概10個中有4個」，不過，最後能堅持投身的不多。「有很多現實問題考慮，例如拍攝經常要到處跑，每天工作時間長，可能連續拍攝多天無法休息，對女性、尤其是有家庭的女人來說很困難，要伴侶願意體諒和幫忙分擔，也要應付來自社會的偏見。」

當初Virginie決定入行，父母很擔心，怕女兒無法找到工作或伴侶，她則坦然面對，「我很喜歡所做的事，只想盡力做下去。」她自覺幸運，沒遇過太多歧視，工作也未斷過。「完成一個拍攝項目，馬上就有下一個。當人們想跟女電影人合作時，自然找上我。我很感謝上一代女電影人的努力，這一代才能享受成果。」

雖然剛畢業時曾任導演創作作品，她認為攝影師崗位更適合自己。「作為導演，你要有說故事的渴望，我這方面需求不強烈，反而更有興趣與其他人合作，幫他們找到所需視覺語言。」電影攝影器材沉重，要經常手持或背在身上，她不覺得是問題。

找上她的，多是帶有一定社會訊息的電影，比利時社會風氣開放多元，即使小眾題材，政府資金也願意資助，因此她才有機會參與。「紀錄片界已有很多女性投身，劇情片界仍然由男人主導，女電影攝影師很罕見。我認為這情況須要改變。這條路的確走得不易，女人要加倍努力進取，拍更多作品累積口碑，才能被接受。一開始工作少，難免要參與一些資金緊絀項目，甚至義務拍攝。不斷創作，廣交人脈，才能讓外界了解你的能力。」

Virginie曾長時間收入微薄，感嘆為拍電影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，女性起步往往比男人困難。她沒孩子，伴侶是電影製片，很諒解她的工作。「換了是其他職業的人，未必能如此包容。」她指出，社會和電影公司對女性的支援很少。「我有些朋友本來也在奮鬥，突然因為離婚要全力照顧孩子，就無法工作下去。如今多了女製片人和女導演，是個不錯開端，相信情況將大有改善。」

Virginie Surdej小檔案

出生地點：波蘭、現居地：比利時

掌鏡作品：The Blue Caftan、Syria、Our Mothers

曾獲獎項：比利時馬格利特獎最佳電影攝影獎 (2017)

撰文：張綺霞

ellacheung@hkej.com

#張綺霞 #城市定格 #訪談錄 - 女電影攝影師說秘魯人口販賣陷阱

女電影攝影師說秘魯人口販賣陷阱



訪談錄

在電影業眾多崗位中，電影攝影師可說最少女性擔任。過去器材沉重，女性總被視為難付不來運體力要求高的工作。隨着科技進步，攝影機日趨輕便，愈來愈多女性投身，然而，想得由男性主導的電影圈認同，又要兼顧家庭責任，並不容易。

入行20年的比利時電影攝影師Virginie Surdej自詡是幸運的人，一路沒遇過太多困難，成績更獲獎項認同。她父母都是太空人，一輩子探索地球外的世界，不過，她對地球上的人興趣更大，電影正提供機會讓她了解每個人的獨特性。「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，都讓我可以在他人的心中度過一段美麗旅程。」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


比利時電影攝影師Virginie Surdej入行20年，專職攝錄多部獲獎作品。(受訪者圖片)



Virginie Surdej拍攝的《以無名之名》懸掛在秘魯人口販賣所內的賣兒少女。(攝影)

Virginie Surdej小檔案
出生地籍：波蘭 現居地：比利時
掌鏡作品：The Blue Caftan、Syria、Our Mothers
曾獲獎項：比利時馬格利特獎最佳電影攝影獎 (2017)

許多貧苦無依少女為了尋找生計出路，被騙到秘魯金礦地。(以無名之名 攝製)

此次Virginie受訪，因她掌鏡的《以無名之名》(By the Name of Tania) 在華放映。電影基於香港新聞中心《以無名之名》女性電影攝影節目，節目一部分(《以無名之名》已放映，其他節目至9月23日)。故事講述一位秘魯印地安少女如何逐步跌入人口販賣的陷阱，或被強迫在礦場當性奴。兩位女導演Mary Jimenez和Benedicte Lénaud訪問多位受賣兒少女，根據她們的證詞與虛構出Tania一角，拍成半虛構紀錄片。

這電影源自她們上一部紀錄片 Sobre las Bravas，當中一個受賣年約15歲時被囚禁於金礦探礦，日曬一日地勞動，唯一安慰是去結院光顧她一見鍾情的女人，一天也難得內有出地法，如果今天不離開，我就會留在這裏，於是決定定婚。當在婚前分別與受賣兒人一起私奔，她拒絕了，因為沒有後退不能離開。

長期受到非人對待

這些受賣者深諳騙局人，為何明明有機會逃脫也會拒絕？兩位導演深入金礦區，採訪多位從事性工作的少女，發現多屬人口販賣受害者，隨後Virginie拍攝當地一位致力營救這些少女的牧師，從他手裡得到大量資料，由此產生真實歷史。她們紛紛與受賣兒的遭遇，透過Tania講述這些少女的心路歷程。

落入圈套的少多是親人已經，無依無靠，或者家破人亡，難以維生，突然有股非常友善的陌生女人出現，借故給她們解決難題，並從可介紹她們到金礦區做侍應，只是工作一陣子就給過上好生活，她們不慮有詐，毅然離開別家，中途人口販子露出真面目，將她們的身分證銷燬，然後用各種手段讓她們服毒，不發覺用暴力搶奪，為其取財盜取銀包，被裝設定時炸彈，只要觸犯罪項炸彈就就要點炸。

因此就算每日日出身體，她們也得不到收入，反而債項不斷累積，治性病都不讓治療。懷孕被迫打胎後，第二天又要加工作，長期的非人對待這些少女失去反抗能力，即受有機會被救，她們也因為無法面對不運過去而拒絕。

電影議題沉重，而且波蘭、只有有人物與環境作畫外聲響，畫面與攝影配合，Virginie拍攝該片很久。Tania一切受賣兒少女的化身，她的旁白都是真實證詞，要用這些畫面配合呈現，我們有不少討論，希望觀眾能走進受賣兒的記憶，與她一起經歷過去。

最後她們找到一種獨特的視覺語言，沒拍攝完滿戲劇張力的虛打，強盜畫面，涉及女孩難以面對的自憐，受害者將痛苦或痛苦，集中呈現女孩在暴力事件後如何努力存活。「我們受賣兒太多細節，反而集中在細節，力求在不表現暴力的情況下談論暴力，讓人更深入了解它的機制，以及所造成創痛。」

電影中有大量受賣兒逃過逃獄的畫面，交代主角如何帶著希望穿過過道，最後卻被囚在其中，飛塵塵和無期延綿，予人無處可逃之感。「她們被未知的恐怖未來困住了。」

為着真實呈現被囚的受賣兒小環境，她們在非常小的空間內拍攝，鏡頭與扮演Tania的演員Lydia相聲息，Lydia並非專業演員，而是住在當地性暴力受害者由議會的女，她曾經被囚禁，她上輪的表現情真意切的過去，身上卻有某種不經不覺的狂熱，兩位導演曾在監獄所舉辦研討會和工作的，見到Lydia後認為適合合人選。

兩位導演和Lydia已入，她小環境開始，讓她習慣鏡頭的存在，因此到這環境後，她很快投入。」Virginie說Lydia的強強精神，正賦予人物實感。

拍攝這些受賣兒故事，她久久無法釋懷，但更肯定自己的真正目的，電影讓這些受賣兒留存，敘述，被聽見，打開國際視聽的同時，讓這些受賣兒對前和受賣兒的女孩找回意識，希望人們意識到這些暴行的存在，嘗試做些什麼。」

認真地說：「我對於人以及他們如何互動十分感興趣，想更深入地了解他們，電影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空間。」

Virginie先入讀比利時的INSAS電影學院，再前往波蘭知名的Leon Schiller Institute進修，波蘭斯基、畢意達、聖克勞德都是著名校友，畢業後，她成為電影攝影師，她短片紀錄片開始，打聽多年，機遇有大製作難題，掌鏡的作品曾獲國際獎項，例如Adam在兩度電影節及兩大基爾電影節獲最佳攝影獎，《Our Mothers》獲最佳攝影獎。

在秘魯電影攝影界，女學不多，「共攝10個中有4個」，不過，最後能堅持拍片的，不多。有很多現實問題考慮，例如拍片經常要到處跑，每天工作時間長，可能連睡都睡不來，對女性，尤其是有家庭的女人來說很困難，兼任位攝影師和繁化分擔，也要應付來自社會的偏見。」

當初Virginie決定入行，父母很擔心，怕女兒無法找到工作或成家，她給出保證：「我從前所拍的事，只想盡力拍下去。」她自營項目，馬上就有下一個。當人們想讓女電影人合作時，自然找上後，我感覺上一代女電影人的努力，這一代才能享受成果。」

雖然剛畢業時擔任導演創作作品，她認為攝影師職位更適合自己。「作為導演，你要會說故事，導演」我工作方面需求不強，但我有經驗與其他人合作，幫他們找到所需視聽語言。」電影攝影器材沉重，要經常手持或背在身上，她不能覺得是問題。

她上的，多是有著一定社會地位的電影，比利時社會其實萬元，即小眾題材，政府資金也願意資助，因此她才有機會參與「紀錄片界已有許多女性投身，劇情片界仍由男人主導，女電影攝影師很罕見，我認為這情況需要改變。這種路的確走得不多，女人如加勞勞進，要定身作攝影機口，才能被接受，一開始工作少，難免參與一些資金緊縮項目，甚至義務拍攝，不斷創作，讓女人際，才讓外外了解你的能力。」

Virginie曾長時間入戲，感觸為拍電影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，女性往往比非人困難。她沒孩子，作陪電影製作，很諳她的工作。除了是其他職業的人，未必能如此包管。」她指出，社會和電影公司對女性的支援很少，「我有用原本也在軍門，突然因為離職要全力照顧孩子，就無法工作下去，如今多了女製片人和女導演，是挺不錯開端，相信情況終大有改善。」

為了拍攝工作經常離家，Virginie(右)偶爾也會感到寂寞。(受訪者圖片)



為了拍攝工作經常離家，Virginie(右)偶爾也會感到寂寞。(受訪者圖片)



為了拍攝工作經常離家，Virginie(右)偶爾也會感到寂寞。(受訪者圖片)